

10
289

党圣元 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A类）

新世纪全球文化格局与中国人文建设

主持人：杨义 叶舒宪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古代文论的现代遭际

新世纪全球文化格局与中国人文建设丛书
GLOBAL CULTURAL STRUCTURE IN THE NEW CENTURY
HUMANITY CONSTRUCTION IN CHINA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古代文论的现代遭际/党圣元
著.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
(新世纪全球文化格局与中国人文建设丛书)
ISBN 978-7-5328-5841-5

I. 在… II. 党… III. 传统文化—关系—现代文化—
研究—中国 IV.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77148号

新世纪全球文化格局与中国人文建设丛书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古代文论的现代遭际

党圣元 著

主 管: 山东出版集团
出 版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321号 邮编:250001)
电 话: (0531)82092663 传真: (0531)82092661
网 址: <http://www.sjs.com.cn>
发 行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
规 格: 787mm×1092mm 16开本
印 张: 18印张
插 页: 2插页
字 数: 258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28-5841-5
定 价: 31.00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总序

“格局观”的全球化与“建设论”的人文学

杨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一批研究人文学术和思想文化的学者,于世纪之交,抱持着对上世纪的反思和对新世纪的前瞻的人文情怀,经过潜心地考察和深入地切磋,形成了一项院级 A 类重大科研项目:全球文化格局与中国人文建设。又经六年的资料准备、思想深化、会议研讨、社会调查和海外访学,终于为读书界奉献出现在的这八部书。参加这个项目的学者有八人,他们是:杨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党圣元(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叶舒宪(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高建平(文学理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孙歌(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钱竞(文学理论研究室前主任,研究员),严平(文学研究所科研处处长,副研究员),刘方喜(文学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其中大多数人具有欧洲、日本和国内名校博士或博士后研究的经历,具有深厚的研究积累和开阔的研究视野。项目由杨义、叶舒宪主持。八部书是:杨义《现代中国学术方法通论》,叶舒宪《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高建平《全球化与中国艺术》,钱竞《中国现代文艺学研究》,党圣元《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古代文论的现代遭际》,孙歌《文学的位置》,刘方喜《“汉

语文化共享体”与中国新诗论争》，以及香山会议论文集《全球化与文学》，其中附有严平主持的关于“全球化与中国人文建设”的调查报告。从这些书题中反复出现的全球化、现代性、方法论和人文建设一类词语中，可见这个项目的关注焦点。

这一系列的问题的提出，与正在作为世界历史过程的所谓“全球化”问题存在着深刻的关系。但是一旦切入过程的内在脉络之后，就会发现：全球化在经济技术方面成为潮流，引发了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多重的和多向度的反应，尤其是引发了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创新、包括思想文化的自主创新的强烈诉求。思想文化的自主创新，必须回答历史与现实在当下指向未来的新进展和新可能，以此为讨论问题的根本点，才能使人文学术与历史发展之间产生血肉的关联。正如《全球化与文学·后记》中所说：“全球化不是我们的选择，而是我们的处境。经济、科学技术、交通、通讯，这一切发展起来以后，无论生活在天涯还是海角，只要是地球人，都成了邻居。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自足，那种‘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的伤感，都已经成为过去。对此我们无法选择。我们所能选择的是，在这个处境中做什么。”处境或存在中的选择，使我们面对着巨大的压力和丰富的机遇，前人没有遭遇到的我们遭遇到了，因而要审时度势，投入也许是没有成规可遵循的创新性智慧。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最动人心弦，也引起最多争议的术语之一，30年前（即1976年）在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影响甚广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一书中，尚是音讯杳然，但实在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果有人替威廉斯先生（他已于1988年谢世）作《关键词》续编，那是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把全球化作为时代标志性的关键词来对待的。

中国学术界何尝回避？回避不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态度。查我们的调查报告便知：有关全球化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界成为热门话题，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出现的新动向，这也是本项目酝酿立项的时候。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收集的社科研究论文索引和其他一些索引类资料所收录的论文看，1978到1985年，没有一篇专论全球化的文章。1986年以后，国内报刊才出现了零星的翻译和介绍西方有关全球化研究情况的短文。直到90年代中后期，全球化开始引起中

国学界的关注,但论文数量还不算太多。1997年以前,专论全球化的论文总共有200多篇。此后,相关论文的数量以惊人的速度连年增长,到2001年,有关全球化研究的文章在这一年就攀升到数千篇。在人大复印资料2001年卷收录的169336篇文章中,仅论文标题中含有“全球化”字样的文章就有1386篇。从中国期刊网收录的文章看,2003年讨论“全球化”的文章多达6311篇,以“全球化”为关键词检索期刊网,可检索到24994篇文章。从统计资料看,在近年的学术界,几乎很难找到一个比全球化更流行的概念。学术界的躁动表明,中国人正深切关注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整装上阵,以期在驾驭充满矛盾、变数和悖论的全球化潮流中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

根据中央编译局专家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无法找到“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个概念或者以“全球”(global)为词根造出的词汇。在1995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仅有三处提到“全球”一词,原文并非“global”,而是德文“Erde”,相当于英文的“Earth”,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空间概念。比如说“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①。又认为:“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②。这种全球经济、政治和国家关系的进程,也被50年后地球另一端的清朝末年维新派的一位志士仁人唐才常感受到了。他说:“西人以动力横绝五洲也。通商传教、觅地布种,其粗迹也。其政学精进不已,辘辘乎突过升平也。无可惧也,无可骇也。乃天之日新、地球之运,而生吾中国之动力也。”^③激进的维新派是想借助工业化的西方“横绝五洲”的动力,催生救亡图存的“吾中国之动力”的。所谓“突过升平”,理论根据来自康有为主张的“公羊三世说”,把社会发展的轨迹描述为“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或呼应着唐才常的同志密友谭嗣同《仁学》中的这番言论:“地球之治也,以有天下而无国也。……人人能自由,是必为无国之民。无国则畛域

①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与注②均参看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成果》第44期,2006年7月3日。

② [德]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41页。

③ 梁启超:《说动》中所引唐才常语,《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北京:中华书局,1994。

化,战争息,猜忌绝,权谋弃,彼我亡,平等出……君主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千里万里,一家一人……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应该说,距今100年前的维新、革命两股思潮,一者主张维新升平,一者主张共和革命,都分别以不同的思维方式指向那个“全球化”的远景。值得深思的是,人们往往喜欢把全球化的发端向前追溯,并且把全球化的景象描绘得一派升平,甚至连谭嗣同、唐才常这些维新志士在激情迸发的时候也未能免俗。但是,全球化乃是带全球性的实力和智慧的博弈,强势集团总想操纵或主导博弈的规则和非规则、标准和双重标准。很难设想天上会无缘无故地掉馅饼,所见的是博弈游戏带上愈来愈广泛和深刻的全球规模。历史的记忆不缺乏沉痛,在百年前弱肉强食的全球局势中,谭嗣同和唐才常为改变国家任人宰割的命运而付出了血的代价。

犹若万有引力维系着地球的物理运转,生产力维系和推动着地球上人类文明形态的转型一样,随着卫星通讯、互联网等高新技术的出现以及跨国公司和全球性经贸、金融、物流组织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愈来愈广泛地波及世界各地,愈来愈直接地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伦敦经济学院政治学教授戴维·赫尔德等认为:全球化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基本的争论之一,“全球化继续塑造着我们的世界,但却是以前所未有的自相矛盾的方式塑造着我们的世界”^①。全球化所以跻身于时代焦点之间,是由于它的来势波澜壮阔,对世界局面和社会结构震撼力极大。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务研究所专家的研究,1990~2005年间,世界GDP每年平均增长率按市场汇率计算为2.4%,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3.5%,而国际货物出口贸易的平均增长率达到5.7%,服务出口贸易的平均增速为6.8%,国际贸易在世界总产出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20%上升到2005年的33%以上。^②如果这些统计准确,那么,全球总产出的1/3已进入了国际贸易的物流之中,其中相当部分直接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对人们的生活方式、质量和时尚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据同一篇文章引用世贸组织的数据,2003年世界货物进出口的50%以

^① [英]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化与反全球化》,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② 裴长洪、林江:《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的新发展》,载《财贸经济》2006年第8期。

上为 10 个发达国家拥有,另外还有 10 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货物进出口已超过全球总额的 1/5。这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不平衡、不均质和不同利之处,从中也可以看出一批发展中国家善于把握经济全球化利弊兼杂的矛盾运动,为自己的发展开拓了旷世难逢的历史机遇。

我们就是在这么一种世界历史趋势中,从不同的知识领域、复杂的文化层面和各异的学术个性上,对中国和与中国相关的文明、文化、文学问题进行整体性和创新性的思索的。在立项以来的六年间,本项目的学者对欧美、日韩、印度、东南亚十几个国家进行了不下二十次的访问、讲学和对话,在国内包括台、港、澳的一系列学术会议上进行广泛的讲演和交流,发表了许多中间性的论文和著作,对自己的学术思路作出了不懈的探索、调整、清理和深化。文化思维在时间空间的积累和相互交叉中突进,在不同知识背景的学人的交往、对话和碰撞中开拓新的境界。对于一个积学深思的学者而言,世界交往范围的拓展,意味着他的学理创新能力的触发和提升。这八部书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指向“全球文化格局与中国人文建设”,这意味着我们经过呕心沥血的上下求索,给全球化中的人文思维提供了起码三条创新性的思路,一是对全球化及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进行不是混沌不分的而是理性分析的“格局观”的考察;二是对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工业文明率先倡导的现代性运行和现代性危机,进行不是简单直线性的而是充满曲线复杂性的“反思型”的认证;三是对全球化冲击下的中国人文学术体系和人文精神建构,进行不是随波逐流的而是自主创新的“建设性”的探究。格局观的理性,反思型的思维,建设性的立场,是我们面对全球化中的当代中国人文问题的创新姿态。

全球化并非迷离恍惚的雾中怪物,而是人类生产力的实实在在的结果。它只不过凭借着现代科技、信息、经贸以及伴随的物流、人流的巨大流量,在各国各地、各实体和群体之间缩短了相互交往接触的距离,增加了相互交往接触的频率和速度,这就是全球化的“缩距增频效

应”。但是，由于挤得越来越紧的全国各地、各实体和群体之间具有不同的“块头”、实力、价值立场和利害关系，比如美国的政治人物就不断地强调他们的“国家利益”，其他各国也不会“人穷志短”，轻易地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拱手相让，因而全球化的“缩距增频效应”很可能在增强人类发展的取长补短、优势互补的同时，磨锐了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敏感和价值紧张。各集团组织之间在增加交往接触的同时，也须增加对碰撞和冲突的处理及协调的力度，这也就深刻地考验着当代人类群体之间求同和纳异的胸怀及能力。显而易见，经济全球化已经内在成为推动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样性的诉求的杠杆，而不可能轻松地简约为推动这些领域的什么“一体化”的杠杆。

在这种有可能优势互补又夹杂着利益紧张的情境中，人文学者应该如何理解全球化背景中的文化本质和动力机制？全球化的动力主体是单边的，还是多边的？由经济主轴驱动的全球化在利益最大化追求中是一意孤行，还是照顾多边，兼容异质，共享文明？我们以历史理性对全球化作“格局观”的考察。所谓“格局”，就是既讲事物的整体性，又讲事物的可分析性及其各个部分的相互关系，其间贯注着一种辩证法的思维，因而这里提倡的就是一种“多边互动的全球化”。至于文化领域，当某些西方国家把文化当成“软实力”而无度膨胀的时候，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发展有必要提防霸权主义把自己经过普泛化包装的价值观，作为对其余多边文化进行“脱色处理”或“脱多色而染单色”的行为标准。因而我们的学者提出了具有文化主体性的“杂五色，去创造”的理念。高建平在《全球化与中国艺术》一书的上编中认为，由于全球化而形成了西方文化的优势地位，迫使非西方文化资源寻找自己身份的确证。国际上因此兴起“文化多样性”的说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为此通过了“宣言”和“公约”。然而这种保护，是不能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相比拟的。“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是依赖一个凌驾于生物之上、力量上有着绝对优势的保护者——人，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则有一个谁是保护者的问题。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权利，而且保护的目的在于创造和发展。在讨论“世界文学”的命题时，为了回应有人将“世界文学”理解为单数的，以此作为“文化全球化”的证据的做法，高建平提出了“复数的世界文学”的批判性思路，认为世界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都可立足于自身的文化立场来对全球文学进行自己的解读和接

受。这使我们联想到,感觉到“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的德国诗人歌德说过:莎士比亚戏剧把他所写的罗马人变成了英国人,他这样做是对的,否则英国人就不会懂。在歌德的心目中,知识的历史犹如一支伟大的复音曲,在这支曲子里一一响起各个民族的声音。^①应该说,“多边互动的全球化”要求互动中的每一边的主体,都有理由以各具特色而又具开放性的文化精神作为自身的旗帜和灵魂。

非西方文化在现代性转型中如何做到“外之不后于世界思潮,内之又弗失民族的血脉”,从而创建既有本民族特色又能与时俱进的文化总体精神,这在20世纪中国人文学学术中积累了深厚的经验和痛切的教训。系统地梳理和总结这份无比珍贵的经验教训,对于新世纪重铸民族灵魂和文化旗帜,具有深刻的应对全球化变局的思想文化意义。杨义的《现代中国学术方法通论》,面对严复、梁启超、王国维、吴梅、胡适、鲁迅、周作人、傅斯年、顾颉刚、陈垣、陈寅恪、郭沫若、钱穆、俞平伯、闻一多、朱自清、宗白华、冯友兰、吴宓、朱光潜、钱钟书、季羨林等一批世纪性学人的丰厚的学术著作,改变了一般的学术史写法,创设了“以学术史材料作方法论文章”的述学体制,以便透视学术巨人在应对中西文化碰撞交融中的文化立场和学思方式。书中把世界视野和文化还原这两条富有内在张力的文化原则,作为双构性的“方法之方法”即“元方法”。因为现代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已把“全球化”和“世界性”的命题推到每个学人的面前,世界视野也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学术方法论的“元方法”的本质属性。伴随佛教内传而出现的“世界”一词,在现代历史进程中已不只是表示时空范围的词语,更根本的是它已经作为一种文化视野和文化方式存在,使我们的文化创造的舞台世界化了。以现代世界人类智慧来激活和展开中国智慧,又用中国智慧来丰富和拓展世界人类智慧,成为学术创新及其现代性的基本思路。同时应该看到,率先发展并形成优势的西方现代思想学术的所谓“世界性”,乃是一种不完整的“有缺陷的世界性”。拥有第一流的文化资源、经验和智慧源泉的中国学人,有必要在文化还原中疏通古今血脉,立足本身资源进行原创,并以此作为与西方思想文化进行平等的深度对话的逻辑起点。20

^① 参看〔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113~11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世纪的一批重要学人正是以语源学、史源学、经典阐释学和知识谱系学等方法进行文化还原和学术开拓，从而推动现代中国学术文化的学科创立和知识转型的。对于现代中国学术而言，世界视野敞开的是天，文化还原落实的是地。天地交泰乃是超越文化霸权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文化态度，由此可以引申出现代化中国学术在应对全球化中的基本立场和方法。

“多边互动的全球化”之多元主体，既有各主权国家，也有相邻国家组合的地理文化区域。有若美国学者戴维·伊格内修斯所形容：“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平面，而是由山河和民族情绪组成的‘搓板’。”^①区域意识的凸显，既是对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有力的应对，又是对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有效深化，这是我们以“格局观”考察全球化的题内之义。区域性的应对，应该发挥体制上的协调和功能上的互惠，还应该发挥文化观念上的认同。体制、功能、观念三维兼备，是推动区域共同体形成的必要条件。孙歌的《文学的位置》以敏锐的问题意识切入东亚区域的历史记忆，它超越了后现代史学理论被庸俗化为用语词置换历史的招数，感受到“历史”的真实分量。日本的两位思想人物竹内好和丸山真男，发现全球化的霸权关系与现代性在全球的渗透过程中互为表里，一个东方国家被吸纳进全球化格局，使得她的人文知识分子在重新定义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时遇到种种困境。书中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该书在历史的脉络里着重讨论了这些基本困境，以及处理方式的歧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中，日本左翼和进步知识分子指责教科书修正主义史学在史料上不真实，并以此为基本策略展开了思想批判。这种方式是否有效地完成了批判任务，尚待讨论。此书分析了这种思维方式的思想传统和学术习惯，并且进一步追溯到1956年日本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关于现代史写作的论争，即“昭和史论争”，从中分析了历史学的想象与文学的想象的不同之处，历史性地勾勒出那些属于思想史的基本母题。在清理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的时候，该书指出这种与日本知识分子的危机感有直接关系的理念，曾在现实中被利用为侵略战争的意识形态。今日之日本知识界“回归亚洲”的努力，无

① [美]戴维·伊格内修斯：《新国家主义》，载《华盛顿邮报》2005年4月20日，《参考消息》2005年4月24日转载。

法回避亚细亚主义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历史要素。因日本侵略邻国的历史纠缠尚未成为过去,故对于亚细亚主义的讨论很难在一个全新的层面上展开,它必须承载历史的重负,并进而处理战争责任和民族国家相对化的悖论关系。东亚区域意识的形成是要面对错综复杂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及难题的,这需要东亚各国文化界付出极大的良知和智慧,因而也是我们人文学者的焦虑之所在。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 1994 年在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作了题为《暧昧的日本人》的讲演,对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把他的国家和国人撕裂而深感忧伤。那么,未来的历史又应该如何超越这种暧昧和撕裂呢?可以说,对于全球化的讨论,不能不从东亚这个最基本的和最切近的视角展开,因为它牵连着自身的历史,左右着我们的现实。

世界上万事万物充满矛盾,它的复杂性在于发展着的某种倾向往往包孕着或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批判性的反思通过对长时段的历史过程的检讨,往往能够揭露出以往潮流遮蔽了的历史潜流的另一面,思想也就在反思中深化和转移。以反思型的思维面对全球化、现代性及其危机之时,就可能引导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科学发展观。与全球化相伴随、相表里的现代性,力图为人类的现代发展勾画特征,制定标准。但是,这些标准主要是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制定的,或如丹尼尔·赫威茨所说:“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仍然存在知识的不公正分配,即新知识从北方到南方的不对称流动。”^①由此形成的现代性论证,虽然包含着人类文明成果的一些特征,但也不乏欧美中心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倾斜。因此它暴露出来的危机,引起了我们的人文学者的深切的忧虑。叶舒宪的《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从现象入手反思现代性的危机,审视了“9·11”事件中作为现代文明象征的纽约世贸大厦在客

人语^① [美]丹尼尔·赫威茨:《人文学科的有待与无待》,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报)》2005年第6期。



机撞击下夷为瓦砾,世纪之交的人、畜、禽互相感染的流行病,以及能源危机、环境恶化对人类生存的威胁等,以致作者痛心疾首地惊呼:我们人类整体性地面临着当年哈姆雷特式的选择——生存还是毁灭?书中介绍了由现代性危机引发的20世纪后期遍及世界的“文化寻根”的潮流,认为这是对全球化的逆向反应,用社会学家罗兰·罗伯森术语,又可以称为“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的表现。^①叶舒宪的著作把“文化寻根”视为20世纪后期西方思想回应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危机的重要变革,它作为一股相互交织呼应的潮流,总体上体现为“三大转向”,即东方转向、原始转向和生态转向。针对欧洲中心主义、白人种族主义、男性中心主义和文明优越于原始的复合性价值体系,文化寻根的反思和批判的锋芒集中在种族、地理、性别、宗教、历史观及文明起源诸方面,具体又可分为六个流派:一是“黑色风暴”,即把西方文明发生史溯源到黑非洲文化传统中去;二是凯尔特复兴,针对白色人种内部盎格鲁-日耳曼优越论,发掘和复兴非主流的少数族裔文化他者的传统;三是女神复兴,重新发掘远古女神以对抗父权制的男神中心神谱,为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两大势力提供文化资源;四是东方转向,学院派精英与民间有识之士把目光转向东方文明,乃至更广义的非西方文化,寻求拯救现代文明病症的异文化药方,引导人类走出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生活误区;五是原始转向,现代文化人类学对原始文化认识的转变,使作为文化他者、殖民征服对象和传教对象的原始人,开始成为陷入现代性危机而不能自拔的西方人需要重新学习和效法的正面形象;六是生态转向,这种观念重建的意识觉醒的前提是西方传统观念导致的人与自然对立,成为现代性危机的一个深层的根源。作者认为,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和能力的限度,是人类在20世纪后期开启的反现代性的新启蒙运动之出发点。非西方文化的国家为了克服自身难以克服的危机而擎起了“文化多样性”的大旗,与此相应,在世界各地兴起了“本土化”的浪潮。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的任务是双重的重估,即对本土古代文化传统的重估和对20世纪西化的新传统的重估,由此而发掘中华多民族文化共存与融合的历史生态遗产在全球语境中的现代

^① [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梁光严译,249~25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价值,成为我们的迫切的课题。

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广阔弘大可致于全球性的文化寻根思潮,具体而微可及于中国百年新诗发展的语言形式问题。刘方喜的《“汉语文化共享体”与中国新诗论争》,就把新诗语言形式置于现代性危机中加以反思性的分析。在作者看来,现代性确实遭遇到了深刻的危机——更重要的是生态危机、技术威胁(如核武器及其扩散)以及人与人、文化族群之间尖锐矛盾所导致的全球性恐怖活动及各种局部战争等等,这已成为一种严酷的现实。现代性内在的危机又体现在经济技术的“工具理性”向政治、文化诸领域渗透而形成强势,导致文化活动中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两个本应互补之项的“自我分裂”。因此作者提炼出一个表述话语——“与汉语形式不可剥离的精神特性”,用以考察20世纪新诗史的精神缺失和形式缺失。从历史层面看,胡适倡导汉诗现代化,摒弃传统语言形式;郭沫若主张汉诗浪漫化和情感化,视语言形式为激情的障碍;戴望舒标举意象,又与新月派注意声情形成二元对立。文艺大众化运动和新民歌运动,看似重视民族形式,却把语言工具用于非人文创造;朦胧诗派似乎在演绎着新月派和现代派的轮回,其后却又在“现代”急转入“后现代”中,跌进直白化、口语化(或被人讽为“口水化”)以至“下半身写作”的漩涡。这种积弊的实质,主要源于“西方中心论”,把先行现代化的西方当做现代化包括诗歌现代化的唯一标准;从而使需要多样的诗歌语言趋向于与西方语言表达形式的“同质化”“一体化”,服从于现代资本的商业逻辑和现代技术的工具理性。作者认为,这是违背语言的本质的,汉语诗歌中最顽强地抵制西方化的因素就是汉语语言的和谐形式化规律。语言形式可以会通民族的人文精神,为此,洪堡特把一种民族语言视为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对于汉语诗歌的进一步发展而言,本土化和人文化应成为重要的主题,若能使“与汉语形式不可剥离的精神特性”丰富起来,岂不是也丰富了人类的精神形态?这也是文化多样的诉求所在。基于建设性的人文立场,在历史反思的基础上,作者还提炼出“汉语文化共享体”认同这一重要理念,强调这种认同与对“政治共同体”认同之间是一种“和而不同”的关系,而实现这两种认同之间的和谐,乃是在中国人文建设中构建“和谐中国”进而构建“和谐世界”的时代需要。对现代性及其危机的反思,结果发现的是一种融入民族的独创性的现代性,一种“杂五色,求创造”的多重主体的现代性。



四

我们对全球化、现代性这类时代关键词的反思,最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还在于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对于中国特征的人文学术体系和民族文化精神的创构,我们抱持着融会中西、贯通古今、自主创新的建设性的文化姿态和学术情怀。这就有必要把全球化视域中正反思维的成果,融合在人文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的自主创新之中,应对着霸权话语和众声喧哗的文化语境而从容对话,发出中国人文学者底气深沉而又悦耳服人的声音。于此,中国人文学者任重而道远焉。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思想变迁,存在着处理古今中西关系中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深刻地影响着学科形态、传统转化和自主创新。党圣元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遭际及其反思》,考察了古典文论领域在处理传统和现代关系上存在的“荣今虐古”和“荣古虐今”两种二元对立的文化态度,认为无论是学科发展的内在理路,还是当下全球化语境之外部影响,均要求我们超越已经困惑中国文论研究一个世纪之久的二元对立模式,在学术理念和方法两个层面上走出一条中西融会贯通而综合创造的路了。该书把民族文化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视为人文创造进取的原动力。若能如此,所谓全球化、网络化以及知识经济时代,并不意味着丧失民族文化个性而完全趋同于别人,民族性、地域性恰恰是一种人文的魅力所在。由此看来,全球化的信息社会既给不同国家、地域的文化提供了对话交流和实现人文资源共享,从而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之更大便利,又强化着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意识,从这一意义上讲,全球化过程又是民族人文价值再发现的过程。事实上,至少在人文方面,“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存在,不会出现文化单一化的“全球化”。于此并不否认对话交流可以促进不同文化系统真善美和以人为本等价值创造方面的相互认同,以及文化制作和传播方式相互接轨;但现代性依然是多元的,对话交流给世界文化格局带来的最理想境界是“和而不同”,这是维系全球文化生态平衡的一个必要前提。

由于文学史研究提倡论从史出,文艺学研究追求借论释史,因而相对而言,文艺学较之文学史更易感受外来理论思潮的影响和渗透。文艺学的古今转型,使旧学和新学从属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形态,甚至不同的价值观念。钱竞的《中国现代文艺学研究》主要是考察这种转变,考察中国现代文艺学的起源及其结构框架的。它分析了西方主要国家的文学思想对中国主流文艺学发生影响的不同分量,认为来自德国和俄罗斯的影响最为重要。德国古典美学和浪漫派文学观念,为文艺学确立了核心观念。梁启超、王国维,以至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的文学理念,主要是围绕着这两大主轴展开的。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王国维作《红楼梦评论》,傅斯年、顾颉刚推崇民间审美观念和研究民间文学,胡适撰写《白话文学史》,黎锦熙等倡导“国语和国语文学”,都属于建立现代文艺学的第一期工程。1930年代文学理论资源更多地转向了俄罗斯和苏联,在鲁迅、茅盾身上留有普列汉诺夫和俄国现实主义的明显影响,在周扬和左翼文学青年那里,则不但有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影响,更有“拉普”和后来的日丹诺夫的观念在起作用。把苏联文艺学的思想总汇与中国革命文艺的特色相结合,形成了影响至今的文学理论框架。在考察了“民间观念”对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整体性影响以及“意识形态领导权”之演变这些关键环节之后,该书又力图贯通中国古代文史观念及西方学者如奥尔巴赫的叙事文学研究成果,以期建立一门独具特色的叙事文艺学。在审视康德美学的时候,关注到英美学术界新近出现对康德审美主义美学的颠覆性批判,以及杜威实用主义再度受到重视的新动向,从而把全球化背景中人文学术建设置于一个开放性的系统之中。

开放性和主体性是现代中国人文学术的创新和建设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维度。开放性和主体性的关系,是视野和根的关系,不可离根而使视野虚脱,也不可离视野而使根萎缩,我们需要的是根系发达的原始创新。这也严峻地考验着人文学者的知识结构和运思能力。高建平《全球化与中国艺术》提出了“美学在中国”和“中国美学”两个值得深入辨析的概念。中国的美学与许多非西方的美学一样,都曾经经历对西方美学的引进和介绍、用中国材料填充西方的美学框架的初建和过渡的阶段。但是,引进不能代替中国美学家的独创,中国美学家有责任承续自己的传统,整理符合中国材料的中国理论,并面对当代中国的

美学现象发言。构建和发展适应时代,与世界其他地方的美学构成对话关系,而且源自中国审美与艺术实践的现代中国美学,这是提出不同于“美学在中国”的“中国美学”概念的理由。该书的主体部分,是“现代语境下的中国绘画精神研究”,它首先在“寻找美的线条”中揭示中国绘画美学的逻辑起点。在中国古代画家心目中,徒手作出的线条才是美的线条,这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画家以几何线条为美是大相径庭的。这就涉及到中国古代“书画同源”说,实际上是把书法用笔成线构形的感受嫁接到绘画中去,从哲学上讲,是对人的生命、身体和动作的强调。由此导致中国绘画作为人的生命运动的痕迹,而不是作为外在物的模仿的特性。西方喻绘画如镜,中国喻绘画如围棋,强调的是绘画的过程、取势的要求、大局观、虚实相生和次序的观念。中国画讲“意在笔先”,也是以意带气,使表现性动作的绘画理论深入到气韵生动的精神源泉。如此解读传统画论,是具有明显的全球化语境中的对话性和人文学理的建设性。建设中国特征的现代人文学理,须从根本入手,于寻找和认证根本之中又须把握那些牵涉全局、开启全局的最基本的关键点。浩如烟海的古代经典、文论、文献以及现代转型中的新学、新知,蕴含着无比丰富的精彩,如何在纷繁复杂中把握其相互联系的中心环节,做到牵一发而动全身,枢纽启动了,全盘皆动,这是对研究者识力的深广程度和穿透功能的极大考验。本项目的诸位学人都致力于此,无论在全球化、现代性、文化多样性,还是各学科领域的关键问题上都作出诸多探讨和尝试,在探源与反思、方法与元方法、深层文化思维方式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可供参考的思路。杨义的《现代中国学术方法通论》在展示了世界视野和文化还原为双构性元方法框架之后,集中关注三个关键点,即感悟、会通和话语原创,把这三者当做方法论的枢纽来对待。该书认为,感悟是贯通和制约意象、意境、神韵等中国诗学基本范畴的重要思维方式,是中国为人类提供的具有东方神韵和魅力的精神文化方式。感悟植根于中国古代的心本思想或道源思想,因而与西方把物我二分的想象、直觉、感性、理性存在着内在的本原上的差异。感悟因禅宗而盛,但禅悟与诗悟存在着对文字载体是否讲究的差别。由于诗有诗教传统,感悟在晋唐之世走了一条迂回的路,首先从书画音乐渗入士人日常生活,然后才在宋代由苏轼和江西诗派将之世俗化,并在严羽的《沧浪诗